

情的融合？

《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本文將以《國史大綱》與域外思想為主題。個人的研究專業是清代中原與內陸亞洲（Inner Asia）關係史，後者約略包含滿洲、蒙古、西藏與新疆等地，同時我對於蒙元以降中國與域外關係也有著廣泛的學術關注以及研究興趣。

文章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談近代中國史學界的「域外」觀；第二部分看《國史大綱》的「域外」論述，也就是錢穆在近代中國史學界的脈絡下，怎麼討論域外的概念；第三部分會從《國史大綱》出發，重新思考「中國」和「域外」，這組雖相關但未必二元對立的觀念。

《國史大綱》的「國」是什麼意思？「史」又是怎樣的史？其實，錢穆所討論的「史」，有很強的

「心史」傳統。他詮釋歷史是談所謂歷史的動力，這已經跳脫現在學界主流實證主義史學的範疇。那麼國史的「國」又是什麼意思？如何定義中國？即便在民初那樣動盪、國族主義興盛的時代，錢穆、傅斯年等學術前輩，仍然都關心這個問題；當代學者如上海復旦大學的葛兆光，也曾寫書討論「何為中國」。事實上，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詮釋，文化上的中國和現實上的中國，並非鐵板一塊。當下我們重讀《國史大綱》，尤其有這樣的現實意義。

我自己讀《國史大綱》的立場是什麼呢？就是從人文的同理心出發，對經典文本進行批判性地閱讀。在中文的語境裡，我們經常會對批判性一詞有誤解，認為批判一定是負面的、情緒性的，或是政治性的。其實不然。批判性在西方的語境裡，是指用獨立的、所謂理性的思考方式，自主地閱讀文本。有點像《孟子·盡心下》所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關於人文同理心，其實也就是錢穆在這本書最前面強調的——人文主義的精神。錢穆個人認同中國歷史就是他的歷史，強調當時的中國，無論是知識界或是一般社會大眾，在對待中國的歷史時，都應該抱持溫情與敬意。今天我們即便將文化上的中國當成所謂的「他者」，或是當成臺灣現代文化養分的一部分，我們也應該抱持著溫情與敬意。不只是對中國歷史，對全世界人類文明的歷史，我們都要抱持著溫情

與敬意。以上是我個人的治史態度以及撰述本文的立足基礎，因此在文章中如有一些和錢穆觀點有所出入之處，非為標新立異、否定前賢，而是以當代立場重讀經典時，學者自當懷抱新材料、新方法以及新問題進行獨立思考，而非完全因循前人觀點。這也是陳寅恪當年倡議「預流說」，主張「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之用意。²

《國史大綱》的時代意義與後世影響，當然是非常巨大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錢穆的通史視野。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多為斷代史，大家專精於一個地域或時期，甚至研究單一歷史事件，但錢穆強調的歷史大脈動、宏觀的歷史書寫，是相當有意義的。這部了不起的著作讓我們反思，傳統與現代之間，其實有變化也有延續。我們今天經常認為，現代與傳統好像是斷裂的關係，譬如覺得科學、民主是來自歐美西方的現代概念，臺灣現代化之後就脫離傳統。其實不是這樣。如果臺灣真的是百分之百的現代化社會，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強的民間信仰？即使在歐美社會，宗教仍然有強大影響力。從延續的角度來看，歷史學本身的現代與過去也不是完全斷裂，以歐美為主的現代實證史學，和過去華文世界歷史研究傳統的乾嘉史學之間，實際上是有延續與變化的。

這邊想延續剛才講的乾嘉史學與現代實證史學之間，談一下錢穆先生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關係。過去很多人討論錢穆跟史語所，把兩者看成扞格不入的關係。不過我閱讀一些史語所

相關材料，如傅斯年圖書館藏史語所檔案後，覺得錢穆與史語所同仁之間，其實並非交惡。誠然，錢穆晚年在《師友雜憶》中回憶傅斯年，認為他對研究生和史語所年輕同仁的指導，主張培養斷代史專才，而不鼓勵太廣泛的治史興趣，如「某生專治明史」，就不許他「上窺元代、下涉清世」，這是有些人好引的一段公案，用以主張錢穆和傅斯年在治學上有矛盾。可是，我們如果讀一九二六年傅斯年寫給胡適的一封信，其實傅先生治中國史的主張是「一面不使之與當時的別的史分」，強調研究中國史時要超越國別史框架，對同時期不同文明有橫向地了解。譬如研究明代的中國，應該要關注鄭和下西洋、去看當時的東南亞。然後，「一面亦不越俎去使與別一時期之同一史合」，就是不要把唐代的中國、明代的中國，跟清代的中國混為一談。傅先生以上所言，大體是為反思二十世紀初中文學界的慣性思考所發，但其觀點至今仍甚有見地。

傅斯年強調的還有一點，是要把所謂製造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的歷史學，就是過去喜歡以論

2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一），頁二六六。

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二〇一三），頁一五一。

4 傅斯年，《傅斯年信》，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七冊（合肥：黃山書社，一九九四），頁三五七。

5 同上註。

帶史，或是像司馬遷以降，臧否、褒貶人物的傳統史學，和現代的實證主流分開。從上面兩點看來，好像錢穆和傅斯年在治學上有很大的差異。但其實錢穆並不只是講求通史觀點的鴻儒，同時也是一位精於史實考據的專家。譬如據楊樹達（一八八五—一九五六）一九三四年的記載，陳寅恪稱：「錢賓四的《先秦諸子繫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這證明了陳寅恪、傅斯年這批實證主義史學，也就是錢穆所謂的科學派或考訂派，同樣認可他的實證工夫。所以其實所謂傳統派或記誦派，和當時的科學派或稱考訂派，並非惡言相向的對立關係，反而在治學理路上有所匯通。

那麼傅斯年是否真的反對通史呢？也未必。他在一九一八年就曾寫過一篇視野宏大的文章，題為〈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發在北京大學的學刊上。他強調中國雖然自黃帝以來，都自稱中國或諸夏，事實上卻不斷與外族混血、融合。其實這點和錢穆的觀點不謀而合，也就是蠻夷戎狄和中原並非血統上的差異，而是文化上的差異，而且是長期混居的。此外，這篇文章也體現我們剛才提到的，傅先生所強調的橫向比較，他拿漢朝與羅馬帝國比較，拿唐朝與查理曼帝國（Charlemagne Empire）比較，而不是將漢與隋唐直接聯繫在一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錢穆雖然採取博通的路徑，但他有「專」的一面；傅斯年強調斷代史，他也有「通」的一面。他們兩人對「通史」的想法只是各有側重，有不同的人詮釋。

近代中國史學界的域外觀

今天按照錢穆的劃分，將當時主要的史學流派歸為三類，傳統／記誦派、革新／宣傳派與科學／考訂派（上冊，頁四一～四三）。首先是傳統／記誦派，錢穆的學術光譜應該是相對接近這個派別的，當時該派還有柳詒徵、呂思勉等人物。傳統／記誦派對域外的看法是什麼？基本上，錢穆認為中國域外觀是因秦漢和平大一統而出現，此前的春秋戰國時期，蠻夷戎狄與華夏是雜居的，當時中國並不存在所謂域外的問題。錢穆以上觀點在接近傳統派的學者中具有代表意義，但需要注意即便傳統派內部也有不少歧異。

再來我們講革新／宣傳派，主要學者有翦伯贊跟白壽彝（一九〇九—二〇〇〇），也可以追溯到顧頡剛的《古史辨》。我之所以沒把顧頡剛寫在這裡，是因為他很難被一刀切割，雖然顧先生後

6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廣州），頁一〇。

7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頁八二。

8 「中國歷史上所謂『諸夏』、『漢族』者，雖自黃唐以來立名無異，而其間外族混入之跡，無代不有。隋亡陳興之間，尤為升降之樞紐。自漢迄唐，非由一系。漢代之中國，與唐代之中國，萬不可謂同出一族，更不可謂同一之中國。取西洋歷史以為喻，漢世猶之羅馬帝國，隋唐猶之察里曼。後之羅馬帝國名號相衍，統緒相傳，而實質大異。」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史學方法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頁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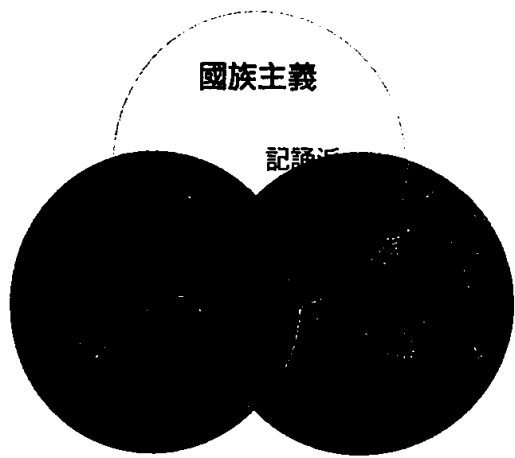
9 顧頡剛，〈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

來更傾向革新／宣傳派，對這派與中國近代馬克思主義史學有很強的影響，但他又有很強的科學／考訂派的基礎。革新／宣傳派的域外觀念，是提倡「自古論」與「共創論」。「自古論」認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已形成，而「共創論」則指出，中國是由五十六個民族共同創造的，這些人都應該被視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所謂五十六個民族的說法，當然是宣傳派中的「共創論」學者為了配合政治風向建構而來的。但這個觀點的貢獻在於，指出許多數民族在中國歷史中有重要地位。後來九〇年代中國共產黨提出「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的政治口號，與宣傳派的「共創論」息息相關。

再來是所謂的科學／考訂派，也就是影響史語所很深的一個傳統。他們的域外觀點，亦即傅斯年跟陳寅恪等人的「虜學」。所謂的「虜學」，是傅斯年相對於「漢學」的玩笑話，不過究其實質內容，實具有遠大的創見。中國過去乾嘉漢學的傳統，是用漢文史料談中原域內的學術，但當時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或歐洲其他東方學者，已經使用回鶻文、粟特文、梵文等印歐文字與漢文史料進行比較研究。這種多語種的比較文獻學方法，在研究中國歷史時非常重要，傳統中國學者卻鮮有人涉足域外文字研究，所以傅斯年提出虜學的概念，要跟西方學者一較長短。與此同時，陳寅恪也提出所謂比較校勘學之說，他舉佛教史研究為例，認為中國傳統學者對魏晉以降佛教的理解，很多都是錯的，因為他們不會梵文、藏文、蒙古文，但這些非漢文域外文獻卻和中國的佛教息息相關。所以他主張把各種非漢文的佛教文獻進行比勘，形成一個比較完整

的歷史學研究。這其實就是當時德國的 philologie，英文是 philology，早期翻譯成「語言學」，但不
是 linguistics，更接近當今中文所說的文獻學或語文學的概念。

我們今天重新來看錢穆提出的三個派別，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自己會把它詮釋成國族主義、馬列主義跟實證主義，還有背後和清代學術傳統交錯。這當然是很粗淺地整理，為了讓讀者能比較快速地理解錢穆的看法。其實宣傳派、記誦派和考訂派，它們三者並非截然對立的，後面有一些共同的思想源泉。以國族主義為例，屬於記誦派的錢穆，當然有很強的國族主義，書中隱含一九三〇年代對日本入侵的悲憤，這無可否定。但當時的宣傳派就沒有國族主義嗎？其實可能比錢穆有過之而無不及。它背後有一個濃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意識形態在支持，所以宣傳派談歷史的階段論，或者講階級鬥爭等的史觀。然後我們看科學派，傅斯年研究東北史的問題，其實正是為了回應日本學者。他就沒有國族主義嗎？有，但他也有很強的實證主義。那麼談到實證主義，記誦派就沒有實證嗎？錢穆繼承乾嘉傳統，陳寅恪便認同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證精湛。所以，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有重疊的，我們姑且用下面這個簡單的文氏圖，帮助大家以視覺化方式理解。



錢穆自己的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其實就影響了《國史大綱》的寫作。我們看錢穆在《師友雜憶》裡面的回顧，他十歲時跟體育老師的談話。他的體育老師不是一般人，是他的同族人，叫錢伯圭（一八八三—一九四七），是一位革命黨人，錢穆受他的政治思想啟蒙很深。錢穆十歲時，錢伯圭問他：「你知道我們今天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錢穆幼小的心靈受到震撼。¹⁰當時小孩子是不清楚滿漢的分別，鄉下的人可能更不知道，因為沒受過教育，也沒接觸過滿洲人。滿漢分別的觀念，其實和革命思想有很密切的關係，像是一九〇三年鄒容（一八八五—一九〇五）發表的《革命軍》，¹¹一九〇六年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發表的〈駁革命可以招瓜分說〉，¹²這些革命黨發表的文字。他們強調滿漢是不同的，倡導民族革命，汪精衛還提出清朝閉關鎖國的說法。後來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談閉關鎖國，就是根據汪精衛的說法發展而來的。錢穆受到革命思潮影響，認為漢、唐乃是中國史上的盛世，而元、清兩代所謂的異族統治則造成中國的破敗，因此在寫《國史大綱》時，唐宋以前寫得非常精彩、篇幅豐富，可是關於元明清的篇幅卻往往十分簡短。常理而言，越晚近的時代史料越加豐富，然而《國史大綱》的篇幅配置卻與史料數量呈反比，一方面固然與錢穆個人的治學興趣有關，但另一方面亦體現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通史書寫「厚古薄今」的特殊現象。錢穆將清朝描繪得非常黑暗，認為是狹隘的部族政權，控制漢人、閉關鎖國等等，這就是受到當時革命思想的影響。所以回過頭反思，和錢穆比較接近的記誦／傳統

派，難道就沒有受到宣傳派的影響嗎？顯然，三個派別是互相聯繫的。

我們進一步來講，《國史大綱》中的中國是什麼樣的概念？是誰的國史？錢穆這本書預設的讀者是誰？《國史大綱》其實一開始是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間，錢穆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講授中國通史時寫的。當時的背景是晚清以降的反傳統思潮，認為所有有關中國傳統的東西都是落後的，導致了清朝無能、被洋人欺辱等等，是這樣一股強烈的民族情緒；另一個時代背景是中日戰爭。我其實有點好奇，錢穆對日本東亞史學界的熟悉程度究竟如何？看起來錢穆應該能夠讀日文書，但似乎不曾直接回應日本東洋史的研究，並不像傅斯年明確反對白鳥庫吉（一八六五—一九四二）等人的滿蒙元清非中國論。錢穆似乎沒有直接針對特定日本東洋史學者的看法，進行系統性地論述，至少我目前尚未見到。

無論如何，中日戰爭影響錢穆《國史大綱》的歷史敘事非常明顯。他對於中國史上外族的痛恨或鄙夷，不完全是當時的歷史事實，而是他對日本人感受的投射。然後錢穆也希望透過這本書，影響他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書時，乃至《國史大綱》正式出版後的讀者。這本書有很強的國族

10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二〇一三），頁三六。

11 鄒容，《革命軍》（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九）。

12 汪精衛，《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民報》第六號（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東京）。

主義色彩，當時中國欠缺和平與大一統，所以《國史大綱》把和平大一統突顯得最重要，與域外相對應。

錢穆到底是如何定義和平大一統的？在《國史大綱》〈引論〉說明主要有三個部分：第一個是「經濟地域之逐次擴大」——由北而南，自西徂東；再來是「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從封建到科舉；然後是「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從貴族到士人（上冊，頁六〇～六一）。這三點確實是中國史上的大問題，也與和平大一統有密切關聯，錢穆對中國史著實有其洞見。我個人最佩服他的一點，其實是論中國起源的多元性，先秦研究是錢穆非常有心得的地方，他在第四章〈霸政時期〉提到胡漢雜居：「舊說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各遠居四裔，而諸夏在中原；此觀念殊不可恃。」（上冊，頁一三〇）也就是說，傳統中國史學認為諸夏在中原，而東西南北有四個不同的民族，但錢穆提出蠻夷戎狄不是四種不同的民族，諸夏與戎狄的差異在文化而非血統，只要戎狄接受華夏文化，就能以夏變夷，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論點，時至今日仍然成立。錢穆所主張的文化論觀點，直到今日仍頗具意義。尤其是時至今日仍有人主張血統論的觀點，譬如用DNA論證單一國家係由單一族群所組成的。從今日の後見之明來看，立基於血統論的歷史論述非常可能造成危險的極端種族主義思想，德國納粹就是典型的悲劇案例。二十世紀初期盛行於歐美的血統論與種族主義思想，也曾影響中國知識界，如當時提倡所謂優生學，就有相關思想淵

源。錢穆反對這種立場，很早就抱持文化論，這是很不容易的。

錢穆在《國史大綱》討論域外的形成，指出域外觀念形成於秦漢大一統「版圖確定，民族搏成」（上冊，頁二七五）後。因為沒有大一統的話，對每個小國、部族而言，其他的所有部族都是外族；秦漢大一統之後，「中國史遂開始有其對外問題」（上冊，頁二七五）。不過，錢穆認為，「中國以民族之優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國國力常卓然高出於四圍外族之上。因此中國史上對外之勝負、強弱，幾乎完全視國內政治為轉移」（上冊，頁二七五）。其實這個觀點再次印證他對時局的看法，暗示中國會遭受到現在這種屈辱，基本上是因為國內政治的問題。《國史大綱》下冊的晚清部分有呼應這個問題，錢穆將他的現實關懷，投射在歷史的詮釋裡。

在錢穆的寫作中，中國與域外兩個觀念，是按照地理或文化論被強力形塑出來的。他預設了我者與他者的對立，預設有一群和華夏不同的人存在。然後還很強調一個論點，亦即認為歷史發展是有動力的。他主張中國概念的形成是一種「情的融合」，錢穆在〈引論〉中說：「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上冊，頁六一、六二）他認為這些非漢族群，都是很自然地感受到漢人的感情與召喚，於是就一起融合了，接受我國文化，終古相依，就如朝鮮、日本與安南。這是錢穆的觀念。

錢穆的域外論述

前面談了大方向，現在來看域外論述，觀察錢穆如何具體討論個案。秦漢統一的對外問題，首先就是匈奴。錢穆在第十一章第二節提出他對考察域外問題的兩個主要論點：一是氣候論、二是經濟論（上冊，頁二八三）。先談氣候論，錢穆指出中國史上的外患，主要多在北方，是受到地勢與氣候的影響。這個論點在國際學界至今仍受關注，許多古氣候學者、考古學者也是用氣候來解釋。簡單來說，北方草原氣候變化較大，冰雹、旱災對遊牧民族的影響非常劇烈。所以當這樣的自然災害發生，或是有大的氣候變遷時，北方遊牧民族就會往南移動，進行劫掠行為。錢穆的氣候論基本上符合現在的科學證據。在經濟論方面，他指出匈奴入塞「所重在經濟財物之掠奪」（上冊，頁二八五），也就是說，匈奴並非為了統一中國而去攻打漢朝，而是因為要搶經濟財物。經濟論也是迄今仍為學術界所認同，所以錢穆這兩個論點可說是歷久彌新。

關於漢朝與匈奴的對抗，錢穆認為「漢武帝撻伐匈奴並不誤」（上冊，頁二九二）。中國史學傳統說漢武帝（前一五六—前八七）好大喜功，撻伐匈奴造成後來國勢衰微。但他覺得這沒有錯，中國對外一定要主戰，「比畏葸自守為勝」（上冊，頁二九二）。這種論述也是和錢穆對當時日本的態度息息相關，其實並沒有史料支持，而是用強烈情感帶入了個人觀點。所以，歷史學者並不完

全是客觀的，讀任何歷史著作時都要記得脈絡化，不能毫無批判地接受作者的觀念，除非他有引用證據去論證，否則不能輕易支持其歷史詮釋。

錢穆談到漢朝與匈奴關係時，提出的兩個經典論點，後來都有學者進一步加以推衍。像是錢穆的高徒余英時的博士論文就是《漢代貿易與擴張》，¹³從經濟論觀點討論漢朝跟匈奴的關係，延續錢穆的觀點，發展成一本專著。現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也寫過《古代中國與其強鄰》（*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¹⁴討論漢朝跟匈奴的關係。不過，這本書是他早期的作品，他現在傾向從環境論來考察匈奴跟漢朝的關係。

我過去受邀評論一些匈奴史相關的著作，其中一本是二〇一九年臺灣引進並出版中文版的林俊雄《草原王權的誕生》（《スキタイと匈奴遊牧の文明》）。¹⁵如果我們跳脫以西歐、華夏文明為中

13 余英時著，鄭文玲等譯，《漢代貿易與擴張：胡漢經濟關係的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八）。

14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簡體中文版：狄宇宙著，賀嚴、高書文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〇）。

15 林俊雄著，《スキタイと匈奴遊牧の文明》（東京：講談社，二〇〇七）。繁體中文版：陳心慧譯，《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游牧國家的文明》（新北：八旗文化，二〇一九）。

心的史觀，從匈奴的角度來看，也許能重新反思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族群。林俊雄是位考古學者，從匈奴考古的立場寫了這本書。他認為，匈奴並非落後、野蠻甚或無知的族群，他們其實很複雜，而且在歐亞大陸東西端扮演很重要的貿易角色。關於匈奴帝國的新研究非常多元，有點超出歷史研究的範疇，這裡無法多談，不過這也顯示現在的學術發展，跟錢穆的時代已經不一樣了。雖然匈奴的史料非常有限，但我們可借助文獻考證、考古學與古氣候學的研究。

以下總結三點，是繼錢穆之後，學者這數十年研究匈奴歷史的新發現。首先，我們發現遊牧過冬的策略在匈奴社會非常重要。過去錢穆認為，因為匈奴是個很脆弱的社會，時常需要去劫掠漢朝（上冊，頁二八六）。不過現在我們知道，今日蒙文所謂「*zud*」，也就是極為嚴重的天然災害，譬如冰雹、旱災等，固然對匈奴族群造成很大的影響。但也正因為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得當時位處蒙古高原的匈奴帝國，形成一種游牧過冬的策略，以維持社會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匈奴社會並不是那麼脆弱、不堪一擊。第二點是，匈奴社會中已經有工匠存在，並非所有人都是牧民，有些人是負責在定點進行金屬冶煉工作，而這些金屬冶煉社群，也會隨著大部隊進行季節性遷徙。然後第三點是，匈奴帝國內部已經有相當的社會分工與科層組織。

二〇二〇年，蒙古國的「龍城」遺址出土了瓦當。這個瓦當和漢朝的規制非常相像，上面刻印著：「天子單于，與天毋（極），千萬歲。」根據以上出土材料，可以提出兩種論點：一是匈奴境

內出土的瓦當，是與漢朝貿易而得到的。可是瓦當這種東西數量龐大，以當時的技術想要大量運送到匈奴境內相當困難。所以有另外一種推測，就是有漢人工匠在匈奴的首都龍城，形成了一個包括有造窯技術、可以燒造瓦當，進行鑄造冶煉的聚落。他們在當地模仿漢朝規制，營造單于的宮殿，所以製造了刻有「天子單于」的瓦當。畢竟我們很難想像，漢朝境內會有人敢稱單于為天子。所以，這個發現驗證了考古學者的觀點，匈奴境內似有定居漢人工匠的聚落。這是錢穆當年無法掌握的地下材料，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也就是地下材料跟傳世文件相互驗證，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有關《國史大綱》的「域外」論述，魏晉以降的情況，當時的重要變化是八王之亂和五胡崛起。錢穆認為，此後中國的文化中心就毀滅了，異族宗教佛教侵入（上冊，頁三二三～三二五）。他覺得域外勢力如匈奴、羯、鮮卑、氐、羌的侵入，造成負面的結果。同時期的歷史學者陳寅恪，他跟錢穆的觀點其實有所接近，但也有所不同。譬如錢穆在《國史大綱》裡列出五胡十六國的表，是把五胡與十六國分開來列，沒有明確講述兩者之間的關係（上冊，頁三三六～三三八）；而陳寅恪在萬繩楠（一九二三—一九九七）整理的《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中，就明確提到五胡跟十六國是

不同的概念。“所以在閱讀《國史大綱》這類宏觀通史著作時，應該要參考其他斷代史家，譬如陳寅恪的專論，在相互比較下會更加清楚，兩位的論點是互相補充的。

接下來講胡人漢化的問題。錢穆的觀察是，五胡之所以能統一中國北部，就是因為胡漢雜居，因為漢化以及胡漢合作。他還以漢化為標準，評價五胡勢力的強弱：匈奴漢化最早，所以最早立國；再來鮮卑漢化最深，所以國力最強；羯、羌漢化比較淺，所以就落後。錢穆是這樣按照漢化的程度，來為五胡的勢力排序。不過他也認為，胡人無論漢化與否，仍是蠻性、淫酗、殘忍的（上冊，頁三四八～三四九）。錢穆就是建構這樣一個形象。當然正史看起來確實也是如此，因為現在留下來的正史是史官以華夏為中心寫出來的，文學史料基本上也是這樣去描述。可是，這樣的敘述是否都是歷史事實？我們可以重新思考。

接著是北朝的部分，就講府兵制跟關隴漢人。這是中國史上的大題目，也是陳寅恪關注的題目。錢穆指出，北魏軍隊原以鮮卑為主體，六鎮之亂後，關隴漢人在西魏嶄露頭角，在北齊也有漢人行伍崛起（上冊，頁四三四）。所以，當時無論在中國東部或西部，漢人的軍政地位都有所提升。錢穆尤其認為關隴漢人集團對後來的隋唐政權，有很強的影響。《國史大綱》是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間，錢穆講義的集結；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二年陳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測〉一文中，亦指出胡化漢人乃北朝政權中重要的軍事中堅力量，並在成書於一九四二年的《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中，進一步發展為「關隴集團」之學說。¹⁷

《國史大綱》裡有〈書成自記〉的部分，錢穆自陳：「時賢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獲，亦不備詳。」（上冊，頁七六）臺灣商務印書館新版的《國史大綱》收錄余英時的〈導讀〉，觀點頗有見地，對這段〈書成自記〉也有很好的發揮。余先生論證錢穆寫《國史大綱》時，有參考陳寅恪一九三七年任史語所集刊發表的〈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陳寅恪提出了府兵制跟關隴豪右之間的關係。¹⁸余先生也論證出，其實錢穆還參考了周一良（一九一三—二〇〇一）一九三八年發表在史語所集刊的〈論宇文周之種族〉一文。¹⁹錢穆寫說宇文氏有匈奴背景，這件事最早是周一良發現的，過去沒有人這麼說。有趣的是，過去我們認為錢穆和傅斯年之間、傳統派和科學派之間水火不容，但如果真是如此，錢穆怎麼可能在他的著作裡參考《史語所集刊》呢？所以，我認為為所謂傳統派與科學派之間，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傳統派參考自考訂派的，比起參考宣傳派、也就是馬列史學的還

16 「十六國之名來源於崔鴻的《十六國春秋》。他所記十六國有他自己的標準。……可見崔鴻所記十六國……非必與五胡聯繫。」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昭明，一九九九），頁九六—九七。

17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八月，北京），頁三九—四八。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重慶：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三）。

18 陳寅恪，《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卷第三期（一九三七，南京），頁二七五—二八六。

19 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卷第四期（一九三八，南京），頁五〇五—五一七。

更多。總之，雖然錢穆寫《國史大綱》沒有下注釋，但我們可以像余先生這樣，一條一條去整理，從細節挖出這些資訊。

回頭看五胡入侵，錢穆認為在那之後，異族的宗教佛教就侵入了，佛教跟域外文化關係非常密切（上冊，頁四五六、四五七）。錢穆認為，佛教傳入跟東漢「王綱解紐」的亂世背景有關（上冊，頁四四九），而五胡君主因為是外族人，所以「崇佛尤殷」（上冊，頁四五六）。他指出，佛教「依自力」、「主救世」（上冊，頁四五七），與中國的儒、道思想有會通之處，且魏晉以降的高僧，如道安（三二一—三八五）、僧肇（三八四—四一四）、慧遠（三三四—四一六）這些人，與兩漢儒士雖然在觀點上不盡相同，但積極影響社會的精神意氣相通（上冊，頁四五九）。出於這些因素，佛教在中國相當普及，隋唐時中國化，進一步向異域傳播（上冊，頁四六六、四六九）。還有就是將禪宗推崇地比較高，這是錢穆對佛教史的認知（上冊，頁四六八）。

繼中古時期的府兵制與佛教文化之後，接下來講隋唐的對外政策。錢穆非常關注隋、唐跟突厥間的互動跟消長，認為在歷史上有重大意義。譬如貞觀四年（六三〇）唐擊破東突厥，西域諸部為唐太宗（五九八—六四九）上「天可汗」號，錢穆認為這就是華夏大一統的象徵。他還注意到了幾個點，唐朝的政治制度或者社會經濟制度上，有所謂非漢或域外的影響，譬如唐初馬政其實有北朝遺風，也就是鮮卑色彩；唐朝後期與回鶻市馬的狀況，錢穆根據漢文史料，對回鶻瘦弱的

馬給唐朝，抱持負面態度，他覺得中國其實什麼東西都有，不用那麼強調和外國通商；還有唐朝開邊太廣，最終導致外強中弱，出現十節度、經略使的擴權問題；玄宗（六八五—七六二）進用蕃將如安祿山（七〇三—七五七），最後導致萬劫不復的安史之亂。這是錢穆的歷史敘事，認為中國接受太多域外的影響，失去華夏的精神，而導致國運崩潰（上冊，頁五四二—五五三）。

所以錢穆談安史之亂，基本上是根據華夷史觀。他認為「唐人既不嚴種姓之防，又不能注意於國家民族的文化教育，而徒養諸胡為爪牙，欲藉以為噬搏之用，則宜釀成此曠古未有之大禍矣」（上冊，頁五五一）。錢穆的意思是，應該有種姓之防。我們現在講唐朝歷史兼容並蓄，甚至有學者比喻，好像美國移民社會大熔爐一樣，但錢穆卻認為這些域外文化是負面的。我們此處不要去批評錢穆，而是應該嘗試把他的論述放置於中日戰爭的時代脈絡中理解，然後再反思要不要接受這樣的論述。錢穆進一步說，安史之亂對唐朝有長期的影響，不只是變亂本身。一方面孕育了胡人主導的五代藩鎮割據勢力（上冊，頁五五三）；另一方面加劇唐中葉以後的外患問題，譬如回鶻跟吐蕃這兩個唐朝的重要外敵（上冊，頁五五七）。

錢穆以上關於安史之亂的論述，值得與其他學者的觀點——特別是錢穆也許會反對的日本東洋史學者，進一步來進行比較。日本歷史學者杉山正明，是研究蒙元史的大師，他參考陳寅恪的講法後，提出一個新概念，認為唐朝是所謂「拓跋國家」，其立國基礎在政治、文化上深受拓拔鮮

卑影響，並非純粹的漢人政權。²⁰另一位重要的東洋史學者森安孝夫，他是國際知名的內陸亞洲史專家，主要研究唐朝跟回鶻、粟特的關係，我過去評論過他的《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一書，中文版書名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²¹讀者可參看。森安孝夫非常強調粟特史觀，這是錢穆比較忽略的一點。錢穆講了很多外族，但沒有提到粟特的事情。其實摩尼教跟回鶻人之間的網絡，對於唐朝影響非常之深。錢穆注意到了回鶻人對唐朝的經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譬如剛才提到回鶻市馬的問題（上冊，頁五五六），還有所謂「回鶻錢」的問題（當時回鶻人在長安或中國境內一些城市放貸，所以有回鶻錢之稱）。不過，這些錢莊其實是粟特人在掌握的。粟特人是一個操伊朗語的族群，來自中亞一帶，在歐亞各地經商，是他們在幫回鶻人經營這些錢莊。此外，森安孝夫提出一個更有意思的觀點，直接回應到我們剛才講的安史之亂。他從內亞史觀來看，認為安史之亂其實是開征服王朝的先河。也就是說，早在蒙古、清朝這些征服王朝之前，安史之亂就可以視為一個先聲，但因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不允許，所以沒有成功。森安孝夫稱之為「過早的征服王朝」，他不是要替安史之亂翻案，不是說它是正面的，而是從宏觀的歷史發展來講，早在蒙古帝國以前，在安史之亂，中國南北農業與遊牧文化之間，就有一個互相交融的趨勢。也就是說，安史之亂的背景不只是唐人沒有嚴華夷之防，而是當時北亞游牧勢力跟南方農業定居文明之間，在文化交流過程中產生了這樣的歷史可能性。

我們再跳回來錢穆的講法。唐以後域外勢力發生轉移，因為西北殘破，中國西北長年戰亂，

加上唐朝跟回鶻、吐蕃間的作戰，兩邊都有消耗，所以主要的域外強敵轉入到東北方（上冊，頁五五八—五五九），就是今天講的滿洲地區。為什麼呢？錢穆認為是因為藩鎮阻隔，當時東北藩鎮和契丹等勢力保持敵不動我不動的關係，導致契丹日後崛起，成立了遼，然後女真繼踵而起（上冊，頁六一八）。當時轉移也涉及到中國域內的轉移，錢穆有一個很精彩的論述是在講這個部分。他說唐中葉以後，以長安為核心的中國西北地區驟衰，五代以後華北進一步衰落，所以中國的社會文化重心南移（上冊，頁六〇七）。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錢穆以後的很多學者，都想解釋中國的社會文化重心為什麼從西北移到東南。包括史語所的全漢昇（一九二—二〇〇一）也要解決這個問題，但他是從運河等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解釋。²²而錢穆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沙陀，他認為是沙陀人主政造成的。藩鎮裡面有很多沙陀人，他們不擅政務，沒有很尊崇中原漢地

20 杉山正明著，《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東京：日本經濟新聞，二〇一一）。繁體中文版：黃美蓉譯，《遊牧民的世界史》（新北：廣場出版，二〇一五）。

21 森安孝夫著，《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二〇〇七）。繁體中文版：張雅婷譯，《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新北：八旗文化，二〇一八）。

22 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二四》（重慶：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四；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九五重排版）。

的政治傳統（上冊，頁六〇四、六一五）。錢穆尤其痛恨一件事情，就是九三八年後晉石敬瑭（八九二—九四二）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事實上石敬瑭本身就不是漢人，所以他割燕雲十六州當兒皇帝，也不會太奇怪（上冊，頁六〇七、六一二）。錢穆之所以要一直強調這件事、批判石敬瑭，甚至寫了很多感慨，其實是因為當時日本入侵華北，他把燕雲十六州跟當時的華北偽政府聯結在一起，石敬瑭對他來說就是漢奸。

錢穆後面講契丹跟遼朝崛起。他說，契丹的情況又跟五代沙陀不一樣，因為契丹人裡面其實有很多是華北漢人，這些人很懂中國的傳統，契丹人得到他們的協助後勢力變強，成為宋朝的心腹大患（上冊，頁六〇四、六一五）。確實，耶律阿保機（八七二—九二六）、耶律德光（九〇二—九四七）這些早期的契丹君主，都重用漢臣，錢穆認為這些人都是漢奸，就像當時華北偽政府的那些人一樣。他這邊有一段文字，講得不長，但是蠻有深意的，是對遼與北魏立國進行比較。錢穆認為北魏漢人地位比較高，因為門第社會尚存，遼代漢人地位就比較低，像走狗一樣（上冊，頁六一六）。這也有他的微言大義在。

接下來進入到宋遼對峙。錢穆認為，宋朝立國以前代為戒，嚴夷夏之防，削藩鎮之兵。這邊很有洞見。遼國一直有很多的華北漢人，成為中國的敵人（上冊，頁六一八、六二二）。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很像民國初年東三省割據，許多人變成漢奸，跟日本人結合，與中國本部為敵。錢

穆的歷史敘事背後，就是這樣的脈絡。還有令他更痛心的一件事是，宋朝在一〇〇五年澶淵之盟後，用歲幣跟遼議和；西夏興起以後，宋朝也是採取歲幣政策，結果契丹人稱因為宋朝有給西夏錢，應給契丹更多錢，而促成一〇四二年慶曆增幣（下冊，頁一九）。錢穆認為，這就像當時國民政府用空間換取時間，是姑息養奸的軟弱做法。這些是我個人的詮釋，不過如果去看他寫的這段，會有一種恨鐵不成鋼地感受。想到中日戰爭的背景，便可以了解他為什麼這麼激動。

隨後，一二二五年金滅了遼，一二二七年又滅了北宋，這些歷史事實大家或許都很熟悉。錢穆在此強調，金滅北宋以後，其實宋朝還是有機會光復，北伐統一中國，但一一四一年紹興議和後，岳飛（一一〇三—一一四二）為奸臣秦檜（一一〇九—一一五五）所害。錢穆很感慨，認為南宋當時並非反抗不了金，是可能收復中原的。有幾項原因，包括將帥人才、南北地理、兵甲便習、心理氣勢、地方財力等等，錢穆列了很多當時南宋擁有的條件，指出最後功虧一簣，就是因為議和（下冊，頁一〇六—一一一）。

後面元明清部分，錢穆講得比較短，從今天的視角來看，也有一些可商榷空間。他對蒙古的看法非常黑暗，說是「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下冊，頁一二五），統治者不重視文治，多不習漢文。然後開始講四等人制，亦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下冊，頁一三一）。這種說法在今天元史學界是被批判的，認為四等人制不存在。雖然確實有分這

四種人，但並不是像過去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畫一個三角形，蒙古人畫在三角形的頂端，再下來是色目人，接著是漢人、南人。我們要承認蒙古人跟色目人確實占有地方特權，但沒有一個制度全面規定蒙古人優於色目人、色目人優於漢人、漢人優於南人，這是後人建構出來的。不過錢穆相信這樣的四等人制，說「蒙古人既看不起漢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漢人、南人」（下冊，頁一三六），所以這個政權注定黑暗，因為它無法漢化。

我們可以在這裡檢視錢穆認識歷史的來源。他對元朝的歷史很熟悉，但對蒙古歷史可能並不那麼熟悉，所以有些問題我們可以在這邊討論。舉個例子，錢穆曾提到一個元朝官職叫「速古兒赤」（下冊，頁一三五），本來應作「速古兒赤」（蒙古文 *sigüci*），有可能是當時錢穆抄錄史料時筆誤，或者是他使用的史料版本不夠精確，又或者是早年出版印刷的手民之誤；無論如何，這類錯誤隨著歷代《國史大綱》的再版而持續保留至今。如果具備蒙古文的基本知識，可知速古兒其實是傘的意思，赤是人稱後綴，速古兒赤即幫皇帝打傘蓋的侍從，也負責掌管他的衣服。這類小錯誤，並不影響錢穆的宏大通史敘事，但就學術史的角度而言，這類例子可看出他對不同斷代史的掌握程度不一。

另一個例子是錢穆講元朝滅亡時，提出一個觀點是元順帝寵幸西藏喇嘛，荒淫無度，終致亡國（下冊，頁一五一）。這其實是明朝以後漢人知識份子對西藏的誤解，直到我們現代臺灣社會也

有。這是汙名化，但這些汙名有其歷史的淵源。因為蒙元統治者跟西藏的關係非常密切，在元朝滅亡時，有些稗官野史——如《庚申外史》——批判元朝與蒙古人，也批判了西藏人。裡面說元朝皇帝的親信喇嘛，在行男女雙修。²³這些實際上是當時漢人的誤解，以及對西藏佛教的妖魔化，用色情化的觀點去看他者的文化，可是錢穆就相信了《庚申外史》的這種論述。我們不能說這個東西完全沒有根據，但作為歷史學者，適不適合僅引用一條史料——尤其是稗官野史、小說者言——就做出這樣的結論呢？這是值得再思考的。

還有一個是「十色」的問題。錢穆說，元朝覺得漢人的讀書人不重要，喇嘛最重要，所以「九儒十丐」，儒者只比乞丐高一等人（下冊，頁一五一、一五三）。此說最早可追溯到謝枋得（一二二六—一二八九）《疊山集》的〈送方伯載歸三山序〉：「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²⁴又鄭思肖（一二四一—一三一八）在其著《心史》中亦謂：「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²⁵然而推敲上述文本脈

23（元明）權衡，《庚申外史》（清雍正六年魚元傳鈔本），頁一三。

24（宋）謝枋得，《疊山集》卷六（《四部叢刊續編》景明本），頁二六。

25（宋）鄭思肖，《心史》卷下（明崇禎本），頁八六。

絡，這類借「滑稽之雄」名義的說法，更像是宋朝遺民對蒙元征服者的批判、諷刺，而非元朝官方真正在全國範圍內所推行的典章制度。如果仔細去讀《元典章》、《至正條格》這些元代政治制度的史料，可以發現裡面不僅沒有九儒十丐的說法，反而可見元代在制度上對儒者與廟學有相當地尊重。錢穆在論述元朝政治制度時，不引《元典章》等史料，反而以「九儒十丐」一類晚宋遺臣的諷刺之言作為立論基礎，或可再議。

接著講明清的部分。錢穆肯定明代開發西南諸省、在南海殖民，然後又說明承元制，在西南設置土官，到清代改土歸流，控制了雲貴高原，形成大一統（下冊，頁二四三～二四四）。可是這中間存在悖論。明代對外開發與殖民，是對上承繼元代、對下影響清代，但錢穆把明代標榜得特別高，又大肆批評元代與清代，在邏輯上似難以自治。不過我們知道他對外族政權有所批判，所以也可以理解。

最後是清朝的部分。錢穆把清朝稱為「狹義的部族政權」，認為他們對漢人非常猜防，任用漢奸，鼓勵大家互相舉告，至於「命官則沿元代，滿、漢分別」，又認為「滿洲、蒙古無微員，宗室無外任」（下冊，頁三四〇～三四四），這些觀點體現晚清、民初漢人對滿蒙人士的刻板印象，甚至說法可說是過於誇張。實際上在清代的官場中，滿洲、蒙古人中出身的微員為數甚眾。爬梳清代檔案可以發現，很多滿洲跟蒙古出身者也只能擔任基層官員。至於宗室無外任，其實有些宗室

根本就沒有當官，絕大多數的清朝宗室都是閒散人等。清朝對宗室是非常猜忌跟提防的，奪嫡的問題很嚴重，宗室被打壓得非常厲害。錢穆雖然生在清代，他的童年可以說曾是清朝人，但這類刻板印象對他的影響非常大，跟現在清史學界的認知是有出入的。

此外，錢穆認為清朝「對蒙古、西藏、青海，則一以舊俗羈縻，扶植喇嘛勢力，禁止漢、蒙通商，皆以政令特意造成閉塞之情勢。」（下冊，頁三五五）這個說法不能說完全不對，我在博士論文中便曾指出清朝其實有意識地控管中原、內亞甚至歐亞大陸間的資訊流通，並且對資訊流通有相當程度的政治以及言論審查，清朝確實刻意不讓中原漢人知道外國的世界發生什麼事。其實康熙（一六五四—一七二二）、雍正（一六七八—一七三五）、乾隆（一七一—一七九九）時就已經認識到鄂圖曼土耳其和印度蒙兀兒帝國，但為什麼清朝的知識人對那些事情一無所知？乾隆甚至知道印度跟伊朗發生戰爭，可是他是不願意讓漢人知道當時國際社會發生這樣大的事情，因為這樣漢人就會體認到清朝不是天下唯一強大的政權。²⁶這些現象背後有深刻的特殊政治以及文化用意。

²⁶ Ling-Wai Kung,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Between China, Inner Asia, and Eurasia, 1621-1911"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21, 6).

不過錢穆說「扶植喇嘛勢力，禁止漢、蒙通商」（下冊，頁三五五），這是有點過甚。清朝對喇嘛的控制非常嚴格，蒙、漢之間也有通商，這些都有很明確的檔案可以回應。「理藩院無漢人」（下冊，頁三五五），這個比較合理，因為當時理藩院是用滿、蒙文書寫公文書，漢人如果不懂滿文，基本上沒有參與機構的能力。錢穆還認為滿洲刻意模仿漢化（下冊，頁三五七），認為晚清太平天國具有「種族革命」的性質（下冊，頁三八八）。這是受到當時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影響，當時有許多革命黨人士很崇拜太平天國，認為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等人打著反滿的旗號，是國民革命的先聲。這些論述都有很強的國民主義性質。

最後，錢穆總結到，「外族」造成中國南北經濟文化轉移，北方社會之所以會衰微，就是因為外族跟邪惡政治的摧殘（下冊，頁二六一）。他列舉：五代藩鎮割據、宋遼西夏對峙、金人猛安謀克搜刮民戶良田、蒙古軍隊殘殺百姓、元代政治黑暗、滿洲入關抄掠圈地。個人認為，這些就像描述日本在華北進行的暴政，錢穆把這些東西全部連在一起講，其實有他當時的關懷。

重思「中國」與「域外」的概念

總結來說，《國史大綱》存在一種二元對立，認為中國跟域外是互相對立的。中國是和平、大一統的，域外夷族會造成分裂與暴力，譬如說五胡亂華、安史之亂；諸夏耕稼文明是高等人，代表和平跟大一統，北方是游牧蠻族，會造成暴力；漢化是光明而進步的，胡化就是黑暗與退步的。就如錢穆在最前面講的，這種敘述談的是東方人「情的融合」，中國人的統一都是和平的，不像歐洲人，如希臘、羅馬帝國都是用打鬥的，也就是西方「力的鬭爭」（上冊，頁六〇～六三）。這是錢穆的二元對立敘事，但真的是這樣子嗎？中國人真的這麼和平嗎？

首先，我們來反思大一統的問題。中國真的是秦漢大一統所締造的嗎？我們來看當代的中國地圖，可以看出今天中國約一半的領土，原本是滿、蒙、藏、突厥等非漢族群的居住區域，學界稱作「內陸亞洲」。其實這些地方都是清朝的遺產，可以追溯到蒙古帝國這個「大朝」（蒙古文 *yelke ulus*），秦漢大一統時並沒有完全控制西藏或青海。所以蒙古人再怎麼不堪，他們仍為現代中國留下這些版圖疆域，但錢穆並不認可。此外，滿洲統治者認為，臺灣、新疆等地乃清朝新開拓之疆域，並非「自古」屬於中國的版圖。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皆有過類似的表述，例如雍正上諭曾說，「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²⁷臺灣跟新疆是滿洲的武功，這是清朝建構的中國觀念。所以我

27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雍正元年八月丙寅條》，《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頁二〇a。

們今天看到大一統，其實跟秦漢相去甚遠，反而是蒙古跟清朝人留下的歷史遺產。

還有，所謂大一統其實很黑暗，因為土地、版圖的擴張背後，就是一條條人命，有血腥、黑暗的成分，不是完全的光明。從今天的角度反思，大一統真的是社會、經濟與文化和平繁榮的必要前提嗎？政治上的「分裂」必然導致黑暗、衰敗嗎？著名羅馬史家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的著作《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Escape from Rome: 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臺灣的中譯本在二〇二二年出版。他說因為大一統的羅馬帝國滅亡，才有後世歐洲各國之間的競爭跟發展，造成了歐洲文明的進步。其實，晚期帝制中國就是大一統，但清朝的政治審查、文字獄跟思想箝制，反而導致中國文化發展受到一些限制。王汎森的经典著作《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²⁹就是在談清代思想的這些情況。當然，王先生沒有直接講大一統的問題，這是我自己閱讀他著作後的再詮釋。

此外，美國的經濟史學者莫基爾（Joel Mokyr）在二〇一七年出版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³⁰在書裡比較歐洲的啟蒙運動跟中國清代的科舉制，思考為什麼歐洲的言論、思想可以被拿出來討論？為什麼清朝沒有？他認為大一統下的科舉制，反而造成思想控制，大家都趨之若鶩地讀一樣的書，因為要考一樣的考試。我自己也研究過一個問題，清朝其實是最早測繪西藏地圖的政權，可是朝廷不讓這些西藏地圖流通，因為覺得很危險，這些地圖描繪

王朝的版圖，是權力的象徵、是統治的祕密。這些地圖最後被北京的耶穌會士傳到歐洲去，帶回法國，在歐洲引發了知識爆炸。³¹十九世紀的英國人進到西藏時，是靠著清朝畫的地圖，可是魏源等晚清士人，仍然把西藏當作是佛教神話中的須彌山。這就導致一個弔詭的現象。西藏的經緯度座標最早是清康熙朝測繪得出的，但因為資訊審查，晚清的人反倒一無所悉，而是歐洲人拿去了，這就是知識內卷化。回到原先的問題，大一統究竟是否光明、促進繁榮？是我們可以反思的課題。

我們再來講第二個問題，「農耕定居」跟「游牧移動」。錢穆認為農耕定居的人比游牧移動者更高級，其實西方也有差不多的觀點，所謂 civilization（文明），是從拉丁文 civilis（城市居民）這個詞來的，能和中國周朝、先秦時期指稱的國人與野人做區別比較，這方面可以參考杜正勝的《周代城邦》。³²可是，以游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社會，是不是就沒有定居聚落？很明顯不是。我

28 Walter Scheidel, *Escape from Rome: 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繁體中文版：沃特·席代爾著，黃煜文譯，《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新北：衛城出版，2021）。

29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30 Joel Mokyr,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31 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二卷第三期（2021年九月，臺北），頁六〇三—六四八。

32 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

們前面講到的匈奴，就有定居的聚落，所謂「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匈奴，也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我們不應該簡單用定居築城和農耕為標準，衡量文明的高下。過去的歷史研究，大多以中國、西歐兩個定居農耕文明為中心，這其實是後見之明。因為中國、歐美現在變成強國，它們又是從農耕定居文明發展而來的，所以我們就用現代觀點去詮釋過去的游牧社會，說他們落後。這種華夏中心跟西歐中心史觀是有問題的，需要反思。這裡分享幾本書，一本是史語所王明珂所著《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³⁴裡面指出游牧者其實也有複雜的社會。另外還有美國學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著的《絲路上的帝國：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中亞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³⁵他也要翻轉歐洲中心論，也就是歐洲文明比中亞文明高等的偏見，指出過去歐亞大陸中央的這些人，其實是溝通東西方文明的關鍵角色。還有一本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森安孝夫《絲路、游牧民與唐帝國》，讀者有興趣可以參看。

最後我想談談，究竟是「情的融合」，還是「帝國主義」？錢穆說中國大一統的形成是情的融合，好像西藏、蒙古、新疆這些人就是對漢文化很親愛，對漢人非常有好感。我們不能否認這一點，現在有很多民族矛盾的問題，在過去是不存在的，以前各族群間通婚頻繁。但是，在文化、社會、經濟的交流之外，是否完全是「情的融合」，沒有「帝國主義」？我在帝國主義加了上下引

號，這裡指的是比較廣義的定義，不是近代歐洲那種帝國主義。總之，中國大一統有沒有廣義的帝國主義問題？

我們看看西漢對匈奴，當時陳湯（？—前六）和甘延壽（生卒年不詳）曾經上疏說：「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³⁶這句話直到今日都非常有名。二〇一五年中國大陸有部賣座的愛國電影《戰狼》，就化用了西漢的這段文字，改稱「犯我中國者，雖遠必誅」。兩千年以後，當代中共主導下的國族主義敘事試圖把「疆漢」替換為「中國」，仍然在引用這套暴力話語。所以我們說西漢跟匈奴真的是「情的融合」嗎？還是兩個強權之間的碰撞跟屠殺？這是第一個例子。再來，錢穆講的東漢羌亂，段熲（？—一七九）曾講過一句話：「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³⁷段熲是東漢名將，專門攻打羌。閱讀《後漢書》可以知道，他割羌人的頭是少說有幾萬顆的，而這變成他的功勞。段熲有把羌人當作是「情的融合」嗎？沒有。他認

33 (漢)司馬遷撰，《史記·匈奴列傳》卷一一〇（金陵書局本），頁二八七九。

34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九）。

35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繁體中文版：白桂思著，苑默文譯，《絲路上的帝國：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中亞史》（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二二）。

36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陳湯傳》卷七〇（武英殿二十四史本），頁二一。

37 (劉宋)范曄撰，《後漢書·段熲傳》卷九五（武英殿二十四史本），頁三三一。

為羌人很卑鄙，投降之後，一撤兵他們又開始叛亂。要對付他們，就是需要把刀子架在他們的脖子上。這是很暴力的，很難說是「情的融合」。錢穆也看到這條史料，但他還是做出跟史料有一點矛盾的論述。

再來看清朝。清朝征服準噶爾汗國，打完仗以後，把男人全部殺掉，女人全部變成俘虜帶走，賞賜給士兵，這是清朝人自己寫的。後來清朝人覺得這太殘忍，便開始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做，稱因為準噶爾人很卑鄙，一直假裝投降，然後又叛變，最後只能把他們屠殺。乾隆為了表現仁君的立場，後來也一直在想理由說明。但事實上就是殺了非常多人，這怎麼能說是「情的融合」呢？

所以大一統一定是情的融合嗎？其實第一個階段一定是「雖遠必誅」、「白刃加頸」，而屠殺完以後，再來建構大一統非常光明的印象。所以我們思考大一統的問題時，要從比較現實地面向去看。大家若對準噶爾的問題感興趣，可以看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⁸⁸另外還有一本蘇吉特·希瓦桑達蘭（Sujit Sivasundaram）的《南方浪潮：印、太海洋民族對抗帝國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⁸⁹內容是講海洋史，談太平洋島嶼居民面對大英帝國跟歐陸帝國的勢力時，怎麼樣去抗爭。因為錢穆比較少講海洋的部分，除了鄭和下西洋的部分，大約講了一、兩頁，而這本書可以為錢穆作些補充。推薦的

這兩本書沒有直接關聯，但談到帝國強權對弱者的控制，以及暴力與統治的記憶，背後存在一些共通性。

小結

說到這裡，以兩點作結。第一點是以獨立思考、批判精神與同情理解，從近代中國史學的脈絡重讀《國史大綱》。經典化不等於偶像化，《國史大綱》是一本經典，但我們不見得要把錢穆當成不可批判的偶像，我想錢穆也不會同意。典範轉移也不是全盤否定，錢穆對古人也有否定。我們剛剛講，蠻夷戎狄跟華夏其實並非二元對立，不是要否定錢穆，而是學術研究本來就是典範轉移。《孟子·盡心下》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對《周書·

38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繁體中文版：葉品岑等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新北：衛城出版，二〇一一年）。

39 Sujit Sivasundaram, *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繁體中文版：蘇吉特·希瓦桑達蘭著，葉品岑譯，《南方浪潮：印、太平洋民族對抗帝國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臺北：時報出版，二〇二二年）。

武成》都只取二三策，我們對《國史大綱》也應該抱持批判精神，盡信書不如無書。

重讀《國史大綱》後，接著尋找它的當代思想意義。我們要超越「大一統」的國族主義史學，到底什麼是「中國」？什麼是「通史」？這些是開放的問題，每個人都應可獨立追尋自己心中的答案。以上提出管見，供各位參考。我覺得應該讓臺灣社會大眾都一起來思考「中國」這個問題。打引號的「中國」究竟為何？這不僅是臺灣人要思考的，也是全世界都要思考的問題。

我的第二點結論是，跳脫「域外」框架，走向「歐亞史」、「海洋史」以及「全球史」。這呼應剛剛講的，我們過去把蠻夷戎狄當成域外的他者，然後自己當作中原人。可是臺灣人是這樣嗎？臺灣其實跟海洋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我們是不是應該從「海洋史」，重新看中國、看亞洲，乃至看世界？關於「歐亞史」，我們可以去思考，歐亞大陸過去被忽視非漢族群的歷史，和臺灣是否有可以參照的地方？例如，蒙古、新疆、西藏、滿洲都有漢人移民，臺灣其實也是有漢人移民到這塊土地上。所以作為一個移民社會，臺灣和蒙古、新疆這些地方其實是有比較性的。

最後講「全球史」的問題。當然，從川普上臺、新冠疫情爆發後，全球化被打上問號，全球史遭受到挑戰。我們的社會真的會走向全球化嗎？還是大家又回到冷戰時期，大國對抗、文明衝突的時代？像是看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中國跟美國的對抗。可是我個人比較樂觀，我相信政治上雖然有衝突，但文化間的交流無法一刀切割，所以全球史還是我關注的對象。即便近年全球化

受到嚴重挑戰，我仍願相信人類文明終會邁向跨國家、地域、種族等藩籬的大同世界。